

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考察

曹壹帆¹ 肖亚成^{2,3}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大批农民创业者为其注入新发展动能。引导退伍军人向农村创业带头人转变，既是解决退伍军人安置问题的有效手段，也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烙印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从军经历可以通过“从军印记”对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具体而言，从军经历可以通过转变个人价值观念、增强个人抗压能力和使农户获取更多的政府补助来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动态效应检验表明，“从军印记”产生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这种影响会随参军时长的增加而增强，随退伍时长的增加而减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作用效果更强。

关键词：农户创业 从军经历 烙印理论 政府补助

中图分类号：E263; F3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保障农民持续增收、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能、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学术界与政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与传统的“治标式救助”相比，农村更为需要的是通过激发内生动力而实现的“治本式帮扶”。创业既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动现代农业与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有效路径（何广文和刘甜，2019），也是构建农村发展新动能、新引擎的重要选择。

早在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本文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返乡创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长效机制与政策研究”（编号：21BGL078）和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先导计划（编号：SWUPilotPlan028）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本文通讯作者：肖亚成。

发布。《意见》指出：“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①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返乡入乡创业园、农村创业孵化实训基地等建设”^②。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农民创业热情逐渐增加。然而，受创业认知、创业能力等个体内在因素的限制，诸多农民难以克服由农村信贷市场不完善、资源匮乏、交易成本高等因素引发的外部约束，农民创业依旧举步维艰（芮正云和方聪龙，2018）。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创业率约为6%，仅是城市居民创业率的一半^③。基于这一现实，本文认为，有必要从个体内部的素质特征出发，找寻影响农民创业的关键因素。

现有研究发现，农民在自身价值观念、风险态度（De Wolf et al., 2007; Rădulescu et al., 2014）等方面的认知以及在社会交往、抗压能力等方面的能力（罗明忠，2012）会对其创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个人认知是人们认识外界事物并对其进行加工的过程，个人能力是根据认知过程完成特定任务的潜在能力。个人认知和能力的形成与改变往往需要多年的历练，后天的经历对个体成长至关重要。由烙印理论可知，个体会在“敏感时期”形成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特征，这些特征会对个体行为产生持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易消退（Marquis and Tilcsik, 2013）。将这一认识应用到对农户创业的分析中，可以认为，“敏感时期”的过往经历会对农民的认知、能力等特征进行重塑，从而可能会对其创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在中国，农户创业多以家庭为单位（甘宇和李伟，2023）。在户主是家庭经济决策主导者的现实背景下，现有研究往往把农户创业近似看作户主个体的创业决策，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户主经历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例如，刘新智和刘雨松（2015）以户主外出务工经历为研究对象，认为户主的外出务工经历会通过提高返乡创业者的创业识别能力来对农户创业行为产生推动作用；杨子砚和文峰（2020）认为，户主的外出务工经历可以为农户创业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对农户创业决策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可见，不少文献已证明户主的个人经历会对农户创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军经历对个体和家庭经济行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对从军经历与农户创业关系的研究却相对缺乏。

一方面，农民参军入伍在中国已是常事。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下，农民成为抗战生力军；解放战争时期，为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独立，大批翻身农民积极参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军是除高等教育以外农村青年的另一条成长途径，大量农村有志青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赖黎等，2016）。随着国际形势的逐渐平稳，中国军人数量逐步下降。在经历11次大规模裁军后，中国军队规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550万逐步缩减到2015年的220万左右（赖黎等，2017），大批退伍军人离开军队走入社会。为填补乡村振兴对人才的现实需求，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力图将

^①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893140.htm。

^②参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2/13/content_5741370.htm?dzb=true&eqid=985fd3ed000584a500000003645cd653。

^③资料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家庭经济调查问卷，具体结果由笔者根据问卷中相关问题计算得出。

退伍军人引流回乡。例如，2021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6部门关于促进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鼓励退役军人到乡村重点产业创业就业”，而且，“对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退役军人，按规定纳入创业扶持政策范围”^①。最终，大量退伍军人在思乡情感与国家政策的引导下，选择回乡创业。据《光明日报》报道，截至2022年8月，已有40多万退役军人返乡创业，有的已成为致富带头人^②。可见，从理论上探究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不仅能为推动退役军人返乡创业提供理论支撑，还能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另一方面，从军经历为个体塑造的印记特征会对个体的经济行为决策产生持续影响。从现实情况来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的案例有助于理解此处的分析。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具有从军经历，这一经历为其塑造了坚韧、乐观、拼搏等个人特征以及爱国爱家的价值观念，使其能够突破千难万阻，最终创立技术领先的华为集团。从理论而言，现有关于从军经历的研究多集中于企业层面，主要探究了企业高管的从军经历对企业并购（赖黎等，2017）、公司创新（权小锋等，2019b）等方面的影响。学者普遍认为，军队层级分明的纪律要求和艰苦的训练环境会通过重塑个体认知、能力等方式对其日后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Elder, 1986）。第一，从认知塑造来看，从军经历会为个体输入爱国、爱民、奉献的价值观念（朱沆等，2020），塑造自信以及高风险偏好的个人性格特征（Killgore et al., 2008）。朱沆等（2020）研究发现，从军经历使企业家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具有从军经历的企业家更倾向于进行个人慈善捐赠活动。权小锋等（2019b）从企业创新的视角出发，认为管理者早期在军队训练与作战经历中形成的自信与高风险偏好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第二，从能力塑造来看，从军经历对个体抗压能力、执行力和领导力（赖黎等，2016）等方面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赖黎等（2017）研究发现，从军经历使企业家具有较强的抗压能力，这使他们能够顶住压力，领导企业完成高风险高收益的企业并购。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从军经历为个体塑造的责任意识、风险偏好和抗压能力等特征同样可能会对农户的创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从军经历对农民个体产生的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影响能否化解其创业面临的外部局限，从而促进农户创业行为的产生？如果能，具体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详细的分析。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

第一，拓展烙印理论的研究边界。自烙印理论被从生物学领域引入管理学领域以来，相关文献多将其用于解释企业高管的过往经历对企业创新（权小锋等，2019b）等经营决策的影响，较少将其用于解释农民个体的过往经历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将烙印理论用于分析个体的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

^①参见《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6部门关于促进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http://www.mva.gov.cn/gongkai/zfxgkpt/zhengce/gfxwj/202209/t20220902_65205.html。

^②资料来源：《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增强》，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2-08/27/nw.D110000gmrb_20220827_2-02.htm。

行为的影响，并从“烙印强化”与“烙印消退”的动态视角考察具体的作用机制。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烙印理论的研究边界，也有助于丰富烙印理论在动态情景下的相关研究。

第二，拓宽有关从军经历的研究范畴。已有文献对从军经历的研究多以企业高管为研究对象（赖黎等，2017；权小锋等，2019b；朱沆等，2020），在中国大批退伍军人选择返回家乡的现实背景下，现有文献对农民从军经历的研究有所忽视。尽管已有学者关注了从军经历带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水平提升会对农民的收入和婚配情况等产生的重要影响（高峰，2021），但并未将这种影响拓展到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分析中。本文的核心是考察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拓展从军经历的研究范畴。

第三，丰富对农户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发生学研究主要存在两个视角。其一，个体主义视角。有研究认为，独特的个人特征诱发了农户创业行为的产生（De Wolf et al, 2007），这些个人特征包括个人知识、技能、道德认知、信仰、价值观念等因素。其二，结构主义视角。有学者强调，外部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等因素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一定影响（朱红根和康兰媛，2013），这些因素包括政府的政策、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但是，无论是个人主义视角还是结构主义视角的研究，都忽视了创业者创业行为产生的历史因素，即没有关注创业者过往经历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虽然已经有研究考察了农民的经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刘新智和刘雨松，2015；郑馨等，2022），但是，对从军经历与农户创业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因此，本文从历史因素的角度出发，探究从军经历如何对农户创业行为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对农户创业的历史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事实上，在中国农村地区，家庭往往是农户创业的基本单位（甘宇和李伟，2023）。并且，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户主在农村家庭事务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现有文献多以户主为研究对象，探究户主的个人特征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例如，周广肃和樊纲（2018）从个人能力的角度探究了户主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周洋和刘雪瑾（2017）从个人认知的角度出发，探究了户主的认知能力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杨子砚和文峰（2020）则研究了户主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本文也从户主视角出发，分析户主的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

创业行为不仅投入大、风险高、不确定性强，还需创业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受农村传统小农思想以及生活习惯等的影响，农民不仅缺乏创业所需的资源，更缺乏对创业的理性认知，多数农民因为怕承担创业风险而放弃了种种创业机遇。在此情况下，本文认为，从军经历为农民打上的“认知印记”、“能力印记”和“资源获取印记”能够有效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烙印理论”起源于组织生态学的“烙印”概念，主要观点是：个体在“敏感时期”会形成与外部环境相匹配的特征，该特征会持续地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不会轻易消失（Milanov and Fernhaber, 2009）。

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农民的从军经历比较符合“烙印”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军队在农村招募的新兵往往是社会阅历尚浅的青年。从生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青年时期正是个体认知与能力形成的“敏感时期”。其次，军队本就是一个对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具有强烈塑造作用的社会化组织（朱沆等，2020），高强度的训练模式、严格的军队纪律等能够为新兵塑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因此，农民在参军入伍之后，其认知会因自身进入角色转换期而进入解冻状态，这意味着参军个体的认知能力特别容易受到军营环境的影响。最后，在纪律严明、训练艰苦的军营中，参军个体会被打上与所处环境相匹配的“内部印记”。有研究表明，由特殊经历所形成的印记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持续影响（Marquis and Tilcsik, 2013）。而且，这种影响还存在“同伴效应”（周怀康等，2021），即不仅会影响当事人，也会对其家中的其他个体产生影响（徐超等，2017）。

不仅如此，在中国特有的文化与制度背景下，政府部门对退伍军人的优待以及社会对退伍军人的特殊审视还会给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附上额外的“外部印记”。这种“外部印记”一定程度上能为从事创业活动的农户提供所需资源，进而对其创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总体而言，军旅生活所产生的从军印记会通过影响农民内部的认知和能力以及外部的资源获取条件，进而影响农户的创业行为。

（一）认知印记、能力印记与外部资源获取印记

1. “认知印记”的影响。一方面，军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会促进退伍军人形成帮扶群众、无私奉献等“军民一家亲”的价值观念。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军民间的“血肉联系”，鼓励军人帮扶群众。在1943年兴起的“双拥运动”中，部队军人大力帮助人民群众从事生产劳作，减轻人民负担（朱沆等，2020）。拥政爱民、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早已深深烙印在中国军人的心中。如今，在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对军人思想政治和价值观教育的重视程度始终如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教育大纲》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有明确规定：新兵入伍训练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按照军政训练比例6:4执行^①。并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将为国家和人民献身的英雄人物树为楷模、立为范本，不断向在役军人宣传爱国爱民、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念。由此看来，与外出务工、经商等经历相比，参加过军、入过伍的农民更可能具有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带动家乡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研究表明，创业是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且有效的渠道（何广文和刘甜，2019），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受自身价值观念的驱动，往往会有较强的动机选择创业。退伍军人刘雄曾表示：“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是真富！”于是他带头创业，自费带领村民外出参观学习。最终，刘雄所在的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吉庆镇崇山村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乡村旅游，实现了全村的脱贫致富^②。

另一方面，军队的训练和作战经验会铸成军人高风险偏好和过度自信的性格特征（权小锋等，2019b）。Killgore et al.（2008）发现，过往的战争经历会提高退伍军人的风险偏好。Elder（1986）的

^①资料来源：《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教育大纲》，http://www.81.cn/jwzl/2009-11/19/content_5573929_6.htm。

^②资料来源：《从外出闯荡到返乡创业 在故土中实现人生价值——退役军人刘雄返乡创业带头脱贫致富侧记》，http://www.mva.gov.cn/xinwen/dfdt/202004/t20200426_39740.html。

研究表明，军队训练会对军人的性格特征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军人在退伍后往往比较自信，从而表现出较低的风险规避倾向。然而，在农村地区，农民普遍具有风险厌恶的特征，对高风险的创业行为存在一定的抵触心理。个体在军队训练经历中所形成的风险偏好与承担意识恰好有助于消除对创业的抵触心理，从而改善他们对创业的风险态度，最终降低自身的风险厌恶心理对创业的抑制作用。

综合来看，从军经历为农民灌输的帮扶群众、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念以及偏好风险和过度自信的性格特征会从认知层面强化其创业动机。根据社会学中的家庭系统理论，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会受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Bowen, 1974）。换言之，在与家人的朝夕相处中，“认知印记”对退伍军人个体的影响可能会通过“同伴效应”（周怀康等，2021）外溢到其他家庭成员（徐超等，2017）。这意味着，“认知印记”不仅会增强户主的创业意愿，还会增强其他家庭成员的创业意愿，从而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户创业行为的产生。

2. “能力印记”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没有从军经历的个体相比，具有从军经历的个体拥有更强的吃苦耐劳和抗压能力、更为高效的决断和执行能力以及更强的学习能力（Elder and Clipp, 1989），这些能力有助于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更好地开展创业活动。具体而言，第一，吃苦耐劳和抗压能力有助于创业者抵抗外部压力。艰苦的军队训练和作战经历可以磨练人的意志，锻炼人吃苦耐劳和持续抗压的能力。Elder and Clipp（1989）的研究发现，过往的战争经历锤炼了老兵的持续抗压能力，使其可以在高压环境下冷静地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同样，Benmelech and Frydman（2015）的研究认为，具有从军经历的公司管理者能够在危机和压力面前做出更好的决策。由此可见，从军经历赋予了农民吃苦耐劳和持续抗压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其可以有效化解农村的艰苦环境和突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对其创业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二，决断和执行能力可以降低创业过程中的突发风险引起的损失。对农户的创业活动尤其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创业活动而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突发性和复杂性要求农民要当机立断、快速决策。Grande（2011）的研究发现，创业者的决断和执行能力与其受教育程度和创业实践经历同等重要。因此，要求在复杂多变的战斗环境下快速决策的军事训练对军人决断能力形成的影响（Elder and Clipp, 1989）以及高纪律性和服从性的军营环境对军人执行能力形成的影响，能够帮助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在遇到自然灾害等突发状况时，快速做出决策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

第三，学习能力有助于创业者获取前沿技能。在中国，在高等教育之外，参军入伍是农村孩子的另一条成长途径。长期注重思想与学习教育的军营环境有助于培育和提升军人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的提升既有助于农民在不断变化的创业环境中提升对优质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也有助于农民快速模仿较难掌握的关键技术，从而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芮正云和史清华，2018）。此外，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使用不仅有助于农民获取与创业相关的信息（周广肃和樊纲，2018），还有助于降低农民对创业活动的风险厌恶程度（张世虎和顾海英，2020），从而促使农民进行创业。然而，要使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作用，使用者需要具有一定的主观学习动力和学习能力（张世虎和顾海英，2020）。因此，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在军队中培育出的学习能力能够帮助其快

速学习并接纳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从而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进行创业。例如，军人陈燕鹏退伍后，选择返乡创业，通过运用“原生态+机械化”的现代种植模式和“农户+电商”的产销合作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增产增收致富^①。

以上分析表明，“能力印记”可以提高个体抵抗外部压力、应对突发风险的能力。同时，与“认知印记”类似，其他家庭成员会通过观察退伍个体的行为表现，对其行为进行模仿和学习，从而间接地受到退伍个体“能力印记”的外溢性影响（徐超等，2017）。最终，这种“能力印记”在提升退伍个体所在家庭抵抗外部压力、应对突发风险等方面能力的同时，还会对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3. “外部资源获取印记”的影响。创业资本匮乏和创业需要较高投入的特征意味着，进行创业的农户无法仅通过家庭的支持获取充足的创业资源。因此，创业者还需要借助外部社会网络获取更多的资金、信息、技术、政策项目等资源支持。本文认为，从军经历为农民附上的“外部印记”恰好能够为农民获取外部资源提供一张“通行证”。具体而言，该“通行证”的优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获取政府支持。针对退役军人的安置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创业就业和优抚安置的保障配套政策。《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12年的士官退出现役的，由人民政府扶持自主就业”；第十九条规定，“对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由部队发给一次性退役金，一次性退役金由中央财政专项安排”^②。此外，从事个体经营的退役军人可以享有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例如，《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明确指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20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③这些规定表明，国家为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二，有助于拓展社会网络。在军队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共进退、共患难”的相处模式易使军人彼此形成深厚的战友情谊。退伍后，虽然战友就业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但是，这些人广泛的职业分布为退伍军人构造了既特殊又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不仅能为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提供重要的信息渠道、技术经验、情感支持等（Yueh, 2009），还能为其提供较为丰厚的物质资本，从而缓解其创业资源匮乏的问题。例如，退役军人黄爱民，放弃省直机关的工作机会毅然返乡创业，在35名退役军人的帮助下克服创业资金不足问题，最终有效带动当地79户贫困户259人增收^④。

^①资料来源：《“农户+电商”模式助力乡村振兴！退伍军人陈燕鹏回乡创业带农增收致富》，https://www.sohu.com/a/573488935_120574100。

^②参见《退役士兵安置条例》，https://www.gov.cn/zwgk/2011-10/30/content_1981589.htm。

^③参见《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8/content_6896456.htm。

^④资料来源：《退役军人黄爱民带35名战友创立产业基地——扶贫战场再冲锋》，<https://www.hxw.gov.cn/content/2020/04/15/11849705.html>。

第三,有助于提高社会信任程度。在中国军人奋力抵抗外敌的过程中,军人保家卫国、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提到“军人”一词,人们往往会想到他们的坚韧意志和优良身体素质等。因此,军人无形中会带给人们一种安全可信的感觉。正因如此,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容易在社会交往中建立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高峰,2021)。良好的社会信任关系不仅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给创业者带来的机会识别与资源获取压力,也有助于降低创业者在商业活动中的交易成本(赵佳佳等,2020),进而促进农户创业。

总体而言,外部资源获取印记能够通过获取政府支持、拓展社会网络和增强社会信任,缓解农户创业资源匮乏等问题,从而对农户创业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有动机、有能力、有条件进行创业。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 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有促进作用。

H2: 从军经历能够通过为农民打上“认知印记”、“能力印记”和“资源获取印记”,对农户创业产生促进作用。

(二) 印记的动态效应

虽然“敏感时期”形成的印记具有持续的影响,但是,印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Marquis and Tilcsik (2013)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印记会更具影响力,而另一些印记的影响则可能会逐渐消退。Dokko et al. (2009)根据印记理论的观点,进一步对印记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进行了解释。在他们看来,处于角色转换期的个体由于原始认知行为模式受到冲击,形成了较强的不安全感 and 不确定性。为降低这种不确定性,个体必须改变原有的认知模式,从而建立一种与新环境相一致的行为模式。由于个体一生会经历多个“敏感时期”,不同“敏感时期”的外部环境存在差异,所以个体的已有印记会根据新的外部环境而发生改变。因此,印记的形成与消退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一般而言,时间是反映印记对个体影响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认知形成期,个体处于某个“敏感时期”的时间越长,个体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印记对其自身的影响作用可能就越强(郑馨等,2022)。当个体离开原有的敏感环境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形成的印记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扰动不断增多,从而可能使原有印记逐渐消退(周怀康等,2021)。因此,随着时间、空间因素的不断变化,“从军印记”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作用也会不断变化。

从个体的认知因角色转换而进入解冻状态开始,为降低全新的军队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个体会改变原有的认知模式,逐步形成与军队环境相一致的“从军印记”。“从军印记”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从烙印强化的角度来看,“敏感时期”的长短与印记的强度与深度具有一定关联(郑馨等,2022)。一般而言,环境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加深。因此,军人“从军印记”的塑造程度会随着入伍时间的延长而提高(权小锋等,2019b)。个体在军队中所处的时间越长,所形成的“从军印记”的强度就越高,这种印记对农户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强。另一方面,从烙印消退的角度来看,当个体退伍之后,由于所处环境发生了改变,原有的“从军印记”难以与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相匹配,因而会逐步淡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干扰因素不断增多,

“从军印记”受到的冲击也不断增强，这会使“从军印记”不断消退，最终，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作用强度会随着退伍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减弱。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3：农民参军时长越长，退伍时间越短，进行创业的概率越高。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数据从2010年开始，每两年对全国城乡居民家庭决策、个体特征等进行科学细致的抽样调查，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代表性。在权衡相关变量完整性与延续性的基础上，本文最终选用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五轮的数据进行研究。

CFPS的数据主要包括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的信息。虽然创业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做出的集体性决策，但是，在中国农村家庭中，户主^①往往在家庭的生产、生活等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本文参照已有文献（杨子砚和文峰，2020）的做法，结合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的相关数据，来探究户主的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处理：第一，剔除非农村样本^②。第二，剔除其他类型户口的样本，仅保留农业户口的样本。第三，由于中国法定成年年龄为18岁，参军入伍的最低年龄为18岁，故本文剔除了户主年龄小于18岁的样本。而且，为保证家庭成员具有创业活力，参照周广肃等（2015）的做法，本文剔除了户主年龄大于65岁的样本。第四，剔除主要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此外，为减轻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最终，本文共计得到9332个观测样本。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创业。结合已有研究（赵佳佳等，2023），本文将农户创业界定为农民以家庭为依托，通过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整合与利用资源要素，最终实现创立新组织、开发新产品和提供新服务的完整过程。在对农户创业的度量方面，本文参照已有研究的普遍做法（周广肃和樊纲，2018），使用受访者对CFPS数据家庭经济调查问卷中“过去12个月，您家中是否有人从事个体私营或开办私营企业”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定义。具体而言，本文将回答“是”的农民家庭定义为进行家庭创业的样本，将相应的被解释变量赋值为1；将回答“否”的农民家庭定义为未进行家庭创业的样本，将相应的被解释变量赋值为0。

^①由于CFPS数据未直接给出家庭户主的信息，同时，考虑到创业是家庭的一项经济行为决策，本文参照现有研究（杨子砚和文峰，2020），将最熟悉家庭财务的受访者作为户主。

^②CFPS项目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标准对家庭社区一级的地址进行城乡属性分类，并在CFPS数据中设置“urban*”变量。本文以此变量作为筛选标准，剔除属于城镇的样本，仅保留属于农村的样本。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户主从军经历。现有研究多关注企业高管的从军经历，并把高管从军经历描述为企业高管曾经有在军校接受军事训练或是在部队服役的经历（赖黎等，2017；朱沅等，2020）。有鉴于此，本文将户主的从军经历界定为具有农村居民户口的户主曾经有接受军事训练或在部队服役的经历。在对户主的从军经历的界定方面，本文使用户主对CFPS数据个人调查问卷中“您是否是退伍军人”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定义。具体而言，将回答“是”的户主视为具有从军经历的个体，将相应的核心解释变量赋值为1；将回答“否”的户主视为不具有从军经历的个体，将相应的核心解释变量赋值为0。

3.控制变量。参照杨子砚和文峰（2020）的研究，本文从个体与家庭两个层面引入控制变量。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的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老人抚养比、从事农业工作、家庭现金存款、家庭贷款。具体而言，受教育程度按照户主的最高学历进行赋值；老人抚养比以CFPS数据个人问卷中的年龄数据为基础，通过家庭中年龄大于等于65岁的人数与家庭总人数的比值来衡量。

4.其他变量。为进一步对本文研究主题下的机制、逻辑等进行验证，本文参照已有研究，选取了一系列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用于检验印记动态效应的变量包括参军时长和退伍时长^①。机制检验变量包括抗压能力和政府补助，分别作为“能力印记”和“外部资源获取印记”的代理变量。对抗压能力而言，本文参照李根丽和尤亮（2022）的做法，使用受访者对CFPS数据2018年个人问卷中“您是放松的，能很好地应付压力”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衡量。本文将“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赋值为1~5的整数。同时，参照周洋和刘雪瑾（2017）的研究，本文对该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该指标均值为0，标准差为1。指标数值越大，表示抗压能力越强。对政府补助而言，本文根据受访者对CFPS问卷中“过去12个月，您家是否收到过政府以现金或者实物形式发放的各类补贴？”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衡量。若回答为“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相关变量的名称、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表1 变量名称、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和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户创业	过去12个月，您家中是否有人从事个体私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是=1，否=0	0.081	0.273	0	1
从军经历	户主是否是退伍军人：是=1，否=0	0.011	0.105	0	1
年龄	户主的年龄（岁）	46.727	11.668	18	65
婚姻状况	户主的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	0.876	0.330	0	1
受教育程度	户主已经完成的最高学历：硕士=7，大学本科=6，大专=5，高中=4，初中=3，小学=2，文盲=1	2.412	1.048	1	5
家庭规模	家庭成员人数（人）	4.139	1.812	1	10

^①退伍时长=调查年份-退伍年份。本文认为，退伍时长越长，“从军印记”越弱。

表 1 (续)

老人抚养比	家庭中年龄大于等于 65 岁的人数占比	0.057	0.121	0	0.5
从事农业工作	家庭成员是否有人从事农业工作: 是=1, 否=0	0.754	0.431	0	1
家庭现金存款	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 (万元)	2.569	5.100	0	30
家庭贷款	家庭待偿贷款额 (万元)	0.583	2.178	0	15
参军时长	从参军到退伍的时长 (年)	0.042	0.437	0	14
退伍时长	从退伍到调查年份的时长 (年)	30.202	11.900	1	43
抗压能力	户主抗压能力指数	0	1	-2.651	1.419
政府补助	家庭是否收到政府补助: 是=1, 否=0	0.670	0.470	0	1

(三)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 1 可知, 在全部样本中, 农户平均创业率为 8.1%, 这一比率与周洋和刘雪瑾 (2017) 等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 户主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户在全样本中占比为 1.1%; 户主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2.412, 表明农村居民的最高学历平均处在小学和初中教育的水平, 这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相符; 家庭规模平均值为 4.139, 不足 5 人, 表明中国农村家庭正趋于小型化; 从事农业工作的均值为 0.754, 表明大多数农村家庭仍然有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家庭现金及存款总额最小值为 0 元, 最大值为 30 万元, 均值为 2.569, 标准差为 5.1, 表明农户拥有的资金较少,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农村内部存在较大贫富差距的现象。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 (赵佳佳等, 2023) 基本相同。

根据户主是否具有从军经历, 本文将全部样本分为户主具有从军经历和户主不具有从军经历两个组别, 进一步统计不同组别农户的创业比例。结果显示, 在不具有从军经历的分组中, 农户的创业比例约为 8%。而在具有从军经历的分组中, 农户的创业比例约为 15%。换言之, 户主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户创业比例大约是不具有从军经历农户的 2 倍。由此可见, 初步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说 H1, 即农民的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 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考虑到农户创业是一个虚拟变量, 故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考察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text{Prob}(Y_{ijt}=1)=\Phi(\beta_0 + \beta_1 \text{army}_{ijt} + \beta_2 X_{ijt} + \beta_3 \text{Year}_t + \beta_4 \text{County}_j) \quad (1)$$

(1) 式中: Y_{ijt} 是表示第 j 个县域的家庭 i 在 t 年是否进行创业的虚拟变量; army_{ijt} 是表示第 j 个县域家庭 i 的户主在 t 年是否具有从军经历的虚拟变量; X_{ijt} 表示个体与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Year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用来控制随时间变动但不随个体变动的变量, 例如宏观经济环境; County_j 表示县域层面的地区固定效应, 用来控制随地区变动的变量, 例如地区创业补贴政策等。同时, 为有效克服随机扰动项潜在的相关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本文在回归分析中使用个体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2. 机制检验回归模型设定。考虑到抗压能力和政府外部支持对创业的促进作用已得到现有文献的普遍支持 (刘新智和刘雨松, 2015; 董保宝等, 2020), 所以, 本文在验证作用机制的合理性时, 仅

需要构建模型，对从军经历与相关机制变量的关系进行验证即可。本文以抗压能力和政府补贴为被解释变量，具体模型如（2）式和（3）式所示：

$$Pre_{ij} = \gamma_0 + \gamma_1 army_{ij} + \gamma_2 X_{ij} + \gamma_3 County_j + \varepsilon_{ij} \quad (2)$$

$$Prob(Sub_{ijt} = 1) = \Phi(\alpha_0 + \alpha_1 army_{ijt} + \alpha_2 X_{ijt} + \alpha_3 Year_t + \alpha_4 County_j) \quad (3)$$

（2）式中： Pre_{ij} 表示第 j 个县域家庭 i 的户主在 2018 年的抗压能力； $army_{ij}$ 表示第 j 个县域家庭 i 的户主在 2018 年是否具有从军经历的虚拟变量； X_{ij} 表示第 j 个县域家庭 i 在 2018 年的个体与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集； ε_{ij} 为随机误差项。（3）式中： Sub_{ijt} 是表示第 j 个县域家庭 i 在 t 年是否获得政府补助的虚拟变量。两式中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前文相同。

（五）相关性分析

对主要变量进行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发现，从军经历与农户创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正相关关系在 1% 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显著，初步说明从军经历有助于促进农户创业。此外，除了年龄和年龄平方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 0.991 外，其余控制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在 0.3 以下，说明控制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农户创业	从军经历	年龄	年龄平方	婚姻状况
农户创业	1				
从军经历	0.028***	1			
年龄	-0.056***	0.075***	1		
年龄平方	-0.059***	0.081***	0.991***	1	
婚姻状况	0.042***	-0.006	0.147***	0.123***	1
受教育程度	0.115***	0.047***	-0.217***	-0.194***	-0.062***
家庭规模	0.068***	-0.025**	-0.056***	-0.071***	0.280***
老人抚养比	-0.007	0.006	0.054***	0.047***	-0.032***
从事农业工作	-0.089***	-0.012	0.196***	0.179***	0.152***
家庭现金存款	0.125***	-0.001	-0.052***	-0.056***	0.028***
家庭贷款	0.118***	-0.013	-0.051***	-0.058***	0.025**
变量	受教育程度	家庭规模	老人抚养比	从事农业工作	家庭现金存款
受教育程度	1				
家庭规模	-0.043***	1			
老人抚养比	-0.082***	0.114***	1		
从事农业工作	-0.154***	0.220***	0.082***	1	
家庭现金存款	0.164***	0.010	0.007	-0.087***	1
家庭贷款	0.038***	0.061***	0.004	-0.003	-0.007

注：***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

四、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为便于理解，表中汇报的均是各个变量对农户创业的平均边际效应。表 3 (1) 列为从军经历与农户创业的单变量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边际效应为 0.057。表 3 (2) 列和 (3) 列依次为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时间与县域层面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边际效应也为正。这说明，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从军经历仍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户主不具有从军经历的家庭相比，户主具有从军经历的家庭进行创业的概率更高。从作用大小看，从军经历使农户创业概率增加了约 5 个百分点。研究假说 H1 得到验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农户创业		(2) 农户创业		(3) 农户创业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从军经历	0.057**	0.022	0.058***	0.022	0.047**	0.021
年龄			0.005***	0.002	0.006***	0.002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婚姻状况			0.033***	0.011	0.033***	0.011
受教育程度			0.023***	0.003	0.021***	0.003
家庭规模			0.010***	0.002	0.010***	0.002
老人抚养比			-0.012	0.026	0.007	0.024
从事农业工作			-0.047***	0.007	-0.046***	0.007
家庭现金存款			0.003***	0.000	0.003***	0.000
家庭贷款			0.008***	0.001	0.008***	0.001
县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9332		9332		9332	

注：①表中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而非回归系数。②因常数项无边际效应，所以未对其进行汇报。③***和**分别表示1%和5%的显著性水平。④标准误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标准误。

本文以表 3 (3) 列的回归结果为基础，分析控制变量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有以下四点：第一，户主年龄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是“倒 U 型”的。通过计算可得，拐点出现在 41 岁左右。这意味着，户主在 41 岁之前，家庭创业的可能性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而在户主年龄超过 41 岁之后，农户创业的可能性会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而不断降低。第二，婚姻状况对农户创业影响的边际效应值为 0.033，说明户主已婚的家庭具有更大的创业概率。可能的解释是，已婚状态的户主同时拥有夫妻双方的社会资本。这能够为家庭筹备创业资金、获取创业信息等带来更多的机会，进而对农户创业行为起到促进作用。第三，受教育程度变量显著，相应的边际效应为正，说明户主的学历对农

户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四，家庭现金存款与家庭贷款两个变量均显著且估计系数均为正，说明良好的资金供给状况对农户创业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前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本文进行了更换回归模型、替换被解释变量、使用村级固定效应、剔除务工经历的影响和增加控制变量五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

1. 更换回归模型。本文进一步采用两种不同的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第一，运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4 (1) 列。可以发现，从军经历变量仍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第二，直接运用 OLS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4 (2) 列。可以发现，从军经历变量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上述两个结果表明，在更换回归模型后，相关估计结果依旧支持本文的研究结论，即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农户创业	(2) 农户创业	(3) 创业经营规模	(4) 农户创业	(5) 农户创业	(6) 农户创业
从军经历	0.046** (0.021)	0.065* (0.035)	0.091** (0.044)	0.049** (0.020)	0.056** (0.026)	0.038* (0.021)
互联网使用						0.032*** (0.007)
务工人数						-0.039*** (0.00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级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104	0.106			
观测值数	9332	9332	9332	9332	5677	6973

注：①表中 (1) 列和 (4) ~ (6) 汇报的均是平均边际效应，(2) 列和 (3) 列汇报的是回归系数。②***、**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③括号内为个体层面聚类标准误。

2.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进一步保证前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参照刘雨松和钱文荣 (2018) 的研究，将创业经营规模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本文采用受访者对 CFPS 调查问卷中的“过去 12 个月，您家庭成员从事几项个体经营活动或开办几家私营企业？”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创业经营规模，并用该变量代替基准回归中的农户创业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此时，由于被解释变量不再是虚拟变量，故本文采用 OLS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4 (3) 列所示。可以发现，从军经历变量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这说明，在更换被解释变量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3.使用村级固定效应。由于地区村落之间的异质性，某些村级层面因素可能会影响农户创业，为控制这些因素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本文在（1）式中控制了村级固定效应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报告于表4（4）列。结果表明，从军经历变量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这说明，在进一步控制村落之间的异质性后，从军经历依旧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4.剔除务工经历的影响。外出务工经历能够促进农民的资金积累，提升个人能力，从而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刘新智和刘雨松，2015）。为有效剥离这一干扰因素对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能影响，本文对户主具有外出务工经历^①的样本进行剔除，仅保留户主不具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汇报于表4的（5）列，从军经历变量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这意味着，在剔除务工经历的影响后，从军经历依然对农户创业具有促进作用，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5.增加控制变量。研究表明，户主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周广肃和樊纲，2018）和家庭外出务工人员（石智雷等，2010）可能会对农户的创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为使前文的估计结果更准确，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增加了互联网使用和务工人员两个控制变量。对互联网使用变量而言，本文运用受访者对CFPS问卷中“是否移动上网”和“是否电脑上网”两个问题的回答来识别。如果受访者对两个问题的回答皆为“否”，则认为户主未使用互联网，同时，将互联网使用变量赋值为0；反之，则认为户主使用互联网，并将相应变量赋值为1。对务工人员变量而言，本文使用受访者对CFPS调查问卷中“过去12个月，您家哪些人外出打工（如去城市打工）挣钱”这一问题的回答对农户外出务工人员进行识别，并根据识别结果汇总计算出农户层面的务工人员变量。加入这两个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汇报于表4（6）列。结果表明，从军经历变量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在控制互联网使用和务工人员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后，从军经历依旧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促进作用，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基准回归模型可能存在选择偏差、遗漏变量、稀有事件偏差等内生性问题^②。第一，选择偏差问题。对农民而言，参军入伍是除接受高等教育外的另一条发展路径。参军与否可能与农民个体的认知水平、家庭背景等有关，这些特征是影响农户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那么，农户创业可能并不是由户主从军经历引起的，而是由上述特征推动的。这会使基准回归模型存在选择偏差问题。第二，遗漏变量问题。尽管本文已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县域层面和时间层面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户创业的因素，但是，许多不可观测的因素仍会对农户创业产生影响，遗漏这些变量可能使本文的回归结果存在偏差。

^①本文以受访者对2018年和2020年CFPS调查问卷中“过去12个月，您家哪些人外出打工（如去城市打工）挣钱？”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识别户主是否具有外出务工经历。若家庭的外出务工人员包括户主，则认为户主有外出务工经历，否则认为其没有外出务工经历。考虑到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问卷中未设置该问题，因此，此处的回归样本仅包含2018年和2020年两年。

^②实际情况表明，参军年龄通常小于创业年龄。并且，经过统计，在本文的样本中，个体的从军经历均发生在农户创业之前。因此，很难存在由创业在前、从军在后引发的互为因果问题。

第三，稀有事件偏差。在本文建立的 Probit 二值选择模型中，由于农户创业变量取值为 0 的样本较多，取值为 1 的样本较少（说明农户创业的概率较低），农户创业可能属于稀有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Probit 二值选择模型进行估计时，即使样本量很大，依旧会产生“稀有事件偏差”。为处理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和“补对数—对数模型”重新进行估计。

1.工具变量法。本文参照现有研究（杨子砚和文峰，2020），以村庄范围内其他户主的从军经历均值^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当地从军经历的均值可以反映该地区从军氛围的强弱程度，从军氛围的强弱会通过不同的效应对个体参军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权小锋等，2019a）。因而，村庄从军经历的均值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从军氛围是一种地区文化特征，并不会对农户创业这种经济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1）列和（2）列为 IV-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工具变量是显著的。而且，弱工具变量检验得到的 AR 值和 Wald 值表明，工具变量对从军经历具有较好的解释力。（2）列中从军经历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此外，本文还运用 IV-2SLS 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汇报于表 5 的（3）列和（4）列。（3）列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村庄从军经历均值是显著的。而且，第一阶段回归中的 F 值为 12.211，大于经验法则的临界值(10)；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 p 值为 0.000，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值为 20.811，大于 10%的显著性水平意义上的 Stock-Yogo 临界值（16.38），拒绝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上述结果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表 5（4）列展示了 IV-2SLS 估计中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表 5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IV-Probit		IV-2SLS		最近邻匹 配（1:2）	Kernel 核匹配	补对数— 对数模型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从军经历 (1)	农户创业 (2)	从军经历 (3)	农户创业 (4)	农户创业 (5)	农户创业 (6)	农户创业 (7)
从军经历		7.352* (4.384)		1.151* (0.614)	0.060** (0.030)	0.047** (0.021)	0.045** (0.021)
从军经历均值	-0.178*** (0.039)		-0.178*** (0.05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AR		3.21 [0.073]					

^①村庄范围内其他户主的从军经历均值指村庄范围内，除本农户外，户主具有从军经历的其他家庭的数量占村庄农户总数的比例。

表 5 (续)

Wald	2.81 [0.094]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12.133 [0.0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20.811				
第一阶段 F 值			12.211				
ATT					0.089** {2.243}	0.073** {2.068}	
村级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8693	8693	8693	8693	314	9332	9332

注：①(1)～(4)列汇报的是回归系数，(5)～(7)列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②***、**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③()中展示的是个体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中展示的是 p 值，{ }中展示的是 T 值。

2.倾向得分匹配法。为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差问题，本文按照户主是否具有从军经历对样本进行分组，将户主具有从军经历的样本作为处理组，不具有从军经历的样本作为对照组。本文将前文所述的控制变量（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老人抚养比、从事农业工作、家庭现金存款、家庭贷款）作为匹配变量，运用 1:2 最近邻匹配和 kernel 核匹配方法为处理组找寻与其特征相似的对照组。在此基础上，运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5) 列和 (6) 列所示。可以发现，从军经历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而且平均处理效应均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这些结果表明，在进一步控制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差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可靠。

3.补对数—对数模型。为有效缓解农户创业频率较低引发的稀有事件偏差可能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使用补对数—对数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5 (7) 列，可以发现，从军经历变量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这意味着，在进行偏差修正后，从军经历依旧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在采用多种方式进一步缓解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差、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可靠。

五、进一步分析

(一) 作用机制检验

1. “认知印记”。本文认为，从军经历有助于农民形成爱国爱民、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念，从而有助于具有从军经历的个体在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观念驱动下返乡创业。为验证这一作用机制，本文借鉴周广肃和樊纲（2018）的做法，按照是否雇佣工人的标准将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两种类型。在本文的分析语境中，这两类创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创业初衷不同：“生存型创业”是

为满足自我生活而进行的自我雇佣式创业，而“机会型创业”则是为了利用市场上的商业机会带动地方村民共同致富而进行的创业。

具体而言，本文将机会型创业样本与未创业样本统称为机会型创业组，将生存型创业样本与未创业样本统称为生存型创业组，并依次展开有关分析。根据本文的逻辑，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应该在机会型创业组中更明显。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根据（1）列对机会型创业组的估计结果，从军经历变量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2）列对生存型创业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再显著。这说明，与户主不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户而言，户主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户更可能选择能够带动地区村民发展的机会型创业。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关于从军经历会通过给户主打上“认知印记”来促进农户创业的理论分析。

表 6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认知印记		能力印记	外部资源获取印记
	机会型创业组	生存型创业组		
	农户创业 (1)	农户创业 (2)	抗压能力 (3)	政府补助 (4)
从军经历	0.017* (0.009)	-0.002 (0.016)	0.154* (0.091)	0.070** (0.035)
健康状况			0.082*** (0.014)	
家庭人均收入				-0.005* (0.003)
重大事件				0.025* (0.01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0.109 (0.381)	
观测值数	8717	8718	4217	7949

注：①（1）列、（2）列和（4）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3）列汇报的是回归系数。②***、**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括号内为个体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2. “能力印记”。在历史、自然、社会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创业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农户创业的地点大多集中在乡村，从事创业活动的农民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创业意愿，还需要有较强的能力以便应对农村落后的创业条件。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从军经历可以使户主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决断能力和学习能力，更有能力化解农村的艰苦环境、突发的自然灾害等对其创业形成的障碍，从而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

为验证上述作用机制，本文将抗压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①，通过（2）式展开相应的回归分析。由于更换了被解释变量，为进一步控制可能会对从军经历和个体抗压能力产生影响的个体特征，本文在回归中进一步加入了个体健康状况变量。健康状况变量通过受访者对 CFPS 问卷中“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度量，本文将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和非常健康分别赋值为 1~5 的整数。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6（3）列，可以发现，健康状况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个体越健康，户主的抗压能力越强。而且，从军经历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从军经历对农民抗压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关于从军经历可以通过为户主打上“能力印记”来促进农户创业的作用机制。

3. “外部资源获取印记”。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得出的基本认识，本文认为，从军经历不仅会为农民打上内部的“认知印记”和“能力印记”，还会为农民打上“外部资源获取印记”。这意味着，与不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相比，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能够更容易地从政府和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进而支持农户创业。

为验证上述作用机制，本文将政府补助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3）式进行回归分析。与前文的做法一致，为进一步控制可能会对从军经历和政府补助的获取同时产生影响的个体特征，本文在回归中加入了家庭人均收入和重大事件两个特征变量。对家庭人均收入，本文用 CFPS 问卷中的人均家庭纯收入（万元/人）度量。对重大事件，本文则使用受访者对 CFPS 问卷中“过去 12 个月，您所在的这个家庭是否发生婚丧嫁娶、孩子出生、子女升学等重大事件”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衡量。如果发生过上述重大事件，则将相应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引入这两个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6（4）列。可以发现，家庭人均收入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负，表明越贫穷的家庭越有机会获得政府补助；重大事件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政府补助；从军经历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户主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家庭更有可能得到政府补助。

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军经历为农民打上了“外部资源获取印记”。这使他们比普通农民更容易从政府和社会获取创业资源，所在家庭更有可能进行创业。本文的研究假说 H2 得到验证。

（二）印记的动态效应

1. 烙印强化：参军时长与农户创业。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从军印记”是个体持续处于敏感的军队环境中产生的。从因角色转换而进入认知解冻状态开始，为降低军队的全新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个体会改变原有的认知模式，并逐步形成与该环境相一致的“从军印记”。由此可见，“从军印记”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敏感时期”的长短与印记的强度和深度关联密切（郑馨等，2022）。一般而言，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加深，军队环境对个体特征的塑造程度会随着入伍时长的增加而提高（权小锋等，2019b）。个体在军队中所处的时间越长，形成的“从军印记”的强度就越高，这种印记对农户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就越强。

^①由于只有 2018 年的 CFPS 问卷设置了有关抗压能力的问题，因此，本文用于检验“能力印记”这一作用机制的样本数据为截面数据，在相应的回归中未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为验证上述理论逻辑，本文将参军时长作为新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汇报于表7（1）列。可以发现，参军时长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该结果表明，随着参军时长的不断增加，军营环境对个体的认知、能力等特征的塑造程度不断增强，“从军印记”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不断提高，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也随之增强。

表7 印记动态效应检验及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农户创业				
	印记动态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分组	
	烙印强化	短退伍时长组	长退伍时长组	低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水平组	高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水平组
(1)	(2)	(3)	(4)	(5)	
参军时长	0.013** (0.005)				
从军经历		0.052* (0.032)	0.046 (0.031)	0.064** (0.028)	0.035 (0.03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值数	9331	8825	8835	4771	4561

注：①表中汇报的是平均边际效应。②**和*分别表示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③括号内为个体层面的聚类标准误。

2.烙印消退：退伍时长与农户创业。从烙印消退的角度来看，虽然“敏感时期”形成的烙印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持续性，但是，烙印并非一成不变。个体一生会经历多个“敏感时期”，已形成的烙印在新的环境中可能不再具有优势，此时个体会主动改变已形成的印记。当个体退伍之后，由于所处敏感环境改变了，已有的“从军印记”难以与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匹配从而逐渐淡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干扰因素不断增多，“从军印记”受到的冲击也不断增加，这会使“从军印记”不断消退，最终，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作用强度也会随着退伍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减弱。

为验证上述分析逻辑，本文将具有从军经历的样本按照退伍时长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将退伍时长小于中位数的样本与不具有从军经历的样本统称为短退伍时长组，将退伍时长大于或等于中位数的样本与不具有从军经历的样本统称为长退伍时长组^①，依次展开有关分析。根据本文的逻辑，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应该在短退伍时长组中更明显。相应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根据（2）列对短退伍时长组的估计结果，从军经历变量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3）列对长退伍时长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在统计上不再显著。上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退伍时长越长，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促进作用越弱的理论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假说 H3 得到验证。

^①由于计算没有从军经历的个体的退伍时长没有意义，故本文仅计算了具有从军经历的户主的退伍时长。不过，这样计算出来的样本量较少，且缺少对照组。为保证回归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上述的分组回归方式进行有关检验。

（三）异质性检验

资本匮乏与由创业的高投入衍生出的资金需求是农户创业面临的重要难题。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需要提供合适的抵押物，同时，非正规金融的作用范围又十分有限，因而，农民难以从传统金融组织获取足够的创业资金，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具有服务范围不受限制的优势，所以，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成为影响农户创业的重要外部条件（黄倩等，2021）。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探究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异质性。具体而言，本文使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科技集团研究院共同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将该指数提供的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省级层面数据与本文的研究样本进行匹配。在匹配的基础上，按照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中位数对全部样本进行分组，将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小于等于中位数的样本归入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组，将其余样本归入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汇报于表7。表7（4）列的估计结果表明，从军经历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5）列的估计结果表明，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对应的边际效应为0.035，在数值上小于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组的边际效应（0.064）。这说明，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相比，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促进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强。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民往往面临更强的融资约束。这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通过从军经历留下的“外部资源获取印记”来获取创业所需资金的意愿。因此，从军经历对此类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也就越强。该异质性检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关于从军经历可以通过打上“外部资源获取印记”的方式促进农户创业的理论分析。

六、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在大力推动农民工、退役军人和大学生等人员返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发展动能的时代背景下，本文使用CFPS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五轮的全国大样本数据，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了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户主不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户相比，户主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户更有可能进行创业。而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从军经历通过为户主打上“从军印记”来对其退伍后的家庭创业行为产生影响。从具体的作用机制看，从军经历通过为农民打上“认知印记”、“能力印记”和“外部资源获取印记”三条具体路径促进农户创业，即从军经历可以通过改变价值观念、提升个人能力和改善外部资源获取条件，使得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有动机、有能力、有条件开展农户创业。对印记动态效应的检验发现，“从军印记”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这种影响随着户主参军时长的增加不断增强，随着退伍时长的增加不断减弱。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鼓励退伍军人返乡创业。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全面完成，中国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政府对乡村的帮扶策略需要由传统的“治标式救助”转向激发内生动力的“治本式帮扶”，推动农民创业是解决乡村产业振兴内生动力缺乏的有效途径。本文以农户创业行为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会随着退伍时长的增加不断减弱。因此，政府应发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聚天下英才而用之”^①的人才观念，完善相关帮扶政策，充分挖掘退伍军人的优势，及时引导退伍军人返乡创业，积极推动具有从军经历的农民进行创业。这样，既能够充分发挥退伍军人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方面的作用，也能够有效解决退伍军人的安置问题。

第二，加大返乡军人知识技能培训和创业资金补助力度。根据本文结论可知，军人无私奉献、爱国爱民的崇高价值观念使其具有较强的动机返乡创业。而且，从军经历使参军个体更可能具有敢于冒险、决策果断、学习能力较强的特征，也使其具有较强的能力进行返乡创业。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为返乡军人打造良好的学习平台，为其提供系统的创业指导培训服务，充分发挥返乡军人优于普通农民的学习能力，提高他们在管理、营销、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平，进一步提升其创业能力。

第三，发展多元融资渠道。资金短缺、创业资源匮乏是限制农户创业的关键因素。本文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的促进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强。这说明，某一地区的融资约束越强，从军经历通过“外部资源获取印记”促进农户创业的作用也就越强，也意味着，融资约束是制约农户创业的另一关键因素。因此，政府不仅要立足农户对创业资金的实际需求，从信用担保体系构建、金融方式创新等维度着手，引导正规金融机构为创业者提供专项贷款，还要有效整合民间社会资本，引导非正式金融机构为农户创业提供多样化的贷款选择，拓宽农户创业的融资渠道。

此外，本文可能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也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一方面，对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创业的具体路径的检验还不够全面。虽然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提出了“认知印记”、“能力印记”和“外部资源获取印记”三条具体的作用机制，但是，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只对每条路径的一个部分进行了检验，而且未能完美规避机制检验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至于下一步的研究，本文认为可以进行相关问卷设计，通过实际调研数据，对每条路径进行更加全面的考证。另一方面，对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创业的异质性分析有待完善。由于不同行业所需要的创业资源不尽相同，而且不同行业的就业带动效应也存在差异，因此，进一步从行业差异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可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此外，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可知，从军经历影响农户创业的作用机制在于军队环境会对个体的特征进行匹配性重塑，进而在重塑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影响农户的创业行为。在下一步的研究中，笔

^①资料来源：《习近平的科技人才观：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http://news.cctv.com/2017/01/09/ART1xUP4SCayWiBiSF8zevwr170109.shtml>。

者将通过问卷调查，在详细收集农户参军与创业信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不同兵种、不同训练环境下，从军经历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异质性。

参考文献

- 1.董保宝、曹琦、罗均梅，2020：《元分析方法在国内外创业研究中的应用述评》，《管理学报》第6期，第937-948页。
- 2.甘宇、李伟，2023：《见贤思齐：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的一个解释》，《农业技术经济》第6期，第99-114页。
- 3.高峰，2021：《参军经历、资本积累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青年研究》第1期，第15-25页。
- 4.何广文、刘甜，2019：《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创业的金融支持研究》，《改革》第9期，第73-82页。
- 5.黄倩、朱鸿志、苏慧媛，202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8期，第85-102页。
- 6.赖黎、巩亚林、马永强，2016：《管理者从军经历、融资偏好与经营业绩》，《管理世界》第8期，第126-136页。
- 7.赖黎、巩亚林、夏晓兰、马永强，2017：《管理者从军经历与企业并购》，《世界经济》第12期，第141-164页。
- 8.李根丽、尤亮，2022：《非认知能力对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的影响》，《财经研究》第3期，第124-138页。
- 9.刘新智、刘雨松，2015：《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基于518份农户创业调查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6期，第4-14页。
- 10.刘雨松、钱文荣，2018：《正规、非正规金融对农户创业决策及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替代效应的视角》，《经济经纬》第2期，第41-47页。
- 11.罗明忠，2012：《个体特征、资源获取与农民创业——基于广东部分地区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第11-19页。
- 12.权小锋、醋卫华、徐星美，2019a：《高管从军经历与公司盈余管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新考察》，《财贸经济》第1期，第98-113页。
- 13.权小锋、醋卫华、尹洪英，2019b：《高管从军经历、管理风格与公司创新》，《南开管理评论》第6期，第140-151页。
- 14.芮正云、方聪龙，2018：《互联网嵌入与农村创业者节俭式创新：二元机会开发的协同与平衡》，《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第96-112页。
- 15.芮正云、史清华，2018：《中国农民工创业绩效提升机制：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基于“能力—资源—认知”综合范式观》，《农业经济问题》第4期，第108-120页。
- 16.石智雷、谭宇、吴海涛，2010：《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第25-37页。
- 17.徐超、吴玲萍、孙文平，2017：《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与返乡农民工创业——来自CHIPS数据的证据》，《财经研究》第12期，第30-44页。
- 18.杨子砚、文峰，2020：《从务工到创业——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升级》，《管理世界》第7期，第171-185页。

- 19.张世虎、顾海英, 2020: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如何缓解乡村居民风险厌恶态度?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第33-51页。
- 20.赵佳佳、魏娟、刘军弟、刘天军, 2020: 《信任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吗? ——基于876个农民创业者的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第90-108页。
- 21.赵佳佳、魏娟、刘天军, 2023: 《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第61-80页。
- 22.郑馨、陈芸、陆思茗、潘哲文, 2022: 《首次创业失败的烙印效应与消退机制》, 《科学学研究》第5期, 第885-895页。
- 23.周广肃、樊纲, 2018: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创业选择——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经济评论》第5期, 第134-147页。
- 24.周广肃、谢绚丽、李力行, 2015: 《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管理世界》第12期, 第121-129页。
- 25.周怀康、姜军辉、葛淳棉、王砚羽、刘善仕, 2021: 《创业归来再出发: 创业烙印如何影响工作绩效?》, 《管理世界》第7期, 第145-161页。
- 26.周洋、刘雪瑾, 2017: 《认知能力与家庭创业——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经济学动态》第2期, 第66-75页。
- 27.朱沅、叶文平、刘嘉琦, 2020: 《从军经历与企业家个人慈善捐赠——烙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第6期, 第179-189页。
- 28.朱红根、康兰媛, 2013: 《金融环境、政策支持与农民创业意愿》, 《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第24-33页。
- 29.Benmelech, E., and C. Frydman, 2015, "Military CEO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17(1): 43-59.
- 30.Bowen, M., 1974, "Alcoholism as Viewed Through Family Systems Theory and Family Psychotherapy",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233: 115-122.
- 31.De Wolf, P., G. McElwee, and H. Schoorlemmer, 2007, "The European Farm Entrepreneu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4(6): 679-692.
- 32.Dokko, G., S. L. Wilk, and N. P. Rothbard, 2009, "Unpacking Prior Experience: How Career History Affects Job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 51-68.
- 33.Elder, G. H., 1986, "Military Times and Turning Points in Men's Liv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2): 233-245.
- 34.Elder, G. H., and E. C. Clipp, 1989, "Combat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Health: Impairment and Resilience in Later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7(2): 311-341.
- 35.Grande, J., 2011, "New Venture Creation in the Farm Sector-Critical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7(2): 220-233.
- 36.Killgore, W. D. S., D. I. Cotting, J. L. Thomas, A. L. Cox, D. McGurk, A. H. Vo, C. A. Castro, and C. W. Hoge, 2008, "Post-Combat Invincibility: Violent Combat Experiences ar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Taking Propensity Following Deployment",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42(13): 1112-1121.

37. Marquis, C., and A. Tilcsik, 2013,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7(1): 195-245.

38. Milanov, H., and S. A. Fernhaber, 2009, "The Impact of Early Imprinting on the Evolution of New Venture Network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4(1): 46-61.

39. Rădulescu, E., L. Marian, and S. Moica, 2014, "Innov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Entrepreneurial Rural Developments",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15: 1495-1500.

40. Yueh, L., 2009, "Self-Employment in Urban China: Networking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3): 471-484.

(作者单位: ¹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²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³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 马太超)

The Impact of Military Experience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CAO Yifan XIAO Yacheng

Abstract: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quires a large number of farmer entrepreneurs to inject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Guiding veterans to transform into rural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mean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veterans' resettle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Based on the imprinting theor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its mechanism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e study finds that military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endogenous and robust check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military experience has an impac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rough military imprint. Specifically, military experience promotes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by improving personal values, enhancing personal ability to resist pressure, and enabling farmers to obtain more government subsidies. The test of imprinting dynamic effect shows that the effect produced by military imprinting is time-varying, which grows with an increase of the duration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diminishes with an increase of the length of discharg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military experience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in areas with a low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Keywords: Farmer's Entrepreneurship; Military Experience; Imprinting Theory; Government Subsidy